

中里见敬《中国文学研究里的叙事学：关于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日本）《集刊东洋学》第69号，1993年5月。

吉田，薰  
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修士大学院生：現代文学専業

<https://hdl.handle.net/2324/13536>

---

出版情報：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pp. 322–324, 2003-07. 北京大学出版社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中里见敬《中国文学研究里的叙事学——关于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日本)《集刊东洋学》第69号,1993年5月。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是在中国文学研究里导入叙事学的大作。它为我们解读了从传统小说、“新小说”、到“五四小说”每一个阶段中所展现出来的小说诞生的姿态。特别是“叙事模式的转变”——从文学形式的观点来重新分析中国近现代小说,是划时代的成就。

第三章的论述是本书的压卷之作。从“传统小说”的全知叙事,到“新小说”的书信、日记、笔记体,再到“五四小说”的独白体,陈平原先生把这形式的变化看成从素材的真实转变成小说表现的真实的真实性追求的质的变化而深入讨论。在这探讨的过程中,当时的许多评论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知道现代文学的成立和文学的真实性的问题在中国、日本和西

方都存在。

叙事学作为符号学的归结,是从把“能指”的“记叙”和“所指”的“史实”分开来开始的;同时,它也否定“语言再现或表达、反映已有的现实和作家意图”的语言观和小说观。选择叙事学,就意味着接受这种语言观的转换。

陈平原将“新的叙事模式是否更准确更生动地表现了现代人的生活与感情”(252页),作为评价“叙事模式”转换的标准,因此,把“发挥个性、表现自我”的“五四”精神,跟“叙事模式”转换的原因联系在一起。这种把小说形式归还给作家精神的做法,跟作为叙事学前提的语言观互不相容,也与本书主张的西方文学的冲突与传统文学的重组带来了现代小说的成立这一注重文学形式的基本主张相龃龉。

陈平原先生对原有的将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政治上的时代转变作为标准,用来划分文学史上的近代、现代、当代这一做法提出异议,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提倡以明显地出现了西方文学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学重组的1898年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点(这一年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在《清议报》上发表,翌年,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解为从传统文学到现代文学的转变时期,那么,现在仍处于这一过程尚未完成的过渡期。这一认识,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有所暗示(254页),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明确表述,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则意味着文学史写作的尝试。

陈平原先生的研究方向让我想起姚斯的《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姚斯企图为重视文学的社会性机能的马克思主义和重视美的机能的形式主义作桥梁,导入读者的“期待视野”的概念,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构想文学史。这本书第五章《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活用俄罗斯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这使原来偏重历史性的文学史带来文学形式方面的观点,成为

崭新的论述。

在中国，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说，最需要的是专深的文学史而不是教科书的文学史，此乃文学史写作的切实问题。比如，现代小说放弃传统小说的通俗性而接近文人化、书面化倾向（297—299页），这一认识，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推翻了原来的文学革命和“五四小说”乃废文言而用白话、进而推进反封建的新文学建立这一总体评价。但是我想强调，与从历史社会主义的观点来单方面地把握文学的诀别，不只在于改写文学史。《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对原来的文学研究投注怀疑的范围非常广。该书除了充分活用叙事学、形式主义、媒体论之外，还借鉴了近几年在文学研究领域里被积极采用的读者论和传播学。这本书的最大意义之一，就是把中国文学从原来的束缚下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探讨由多方面的因素所产生的文学文本。